

# 民主論壇

第一卷 第五期

這一週

再論和平的展望

美蘇衝突及其橋樑

經濟機

行憲條

我們

的陣線

演講生意

論戰後外交

編輯室

公誠

羅志如

吳貞會

鄒文海

丁洪範

Upton Close  
柳村譯

景蘇

• 逢星期六出版 • 售一千五百元 •

# 這一週

## 生活指數解凍 及勞資糾紛

上海生活指數解凍，這是工人的福音，因為職員以及政府雇用的人員，均不適用同一標準。爲了這件事情，最近上海會引起不少的勞資糾紛。資方於發放工資之時，未能完全按照新的指數，理由是不勝負擔；勞方因資方這種辦法實違害他們已得的權利，紛紛請社會局仲裁。據資方陳訴：工人底薪較戰前增多，如欲完全按照新生活指數付給工資，勢非降低底薪恢復戰前標準不可。總之，工廠的維持，在目前已極感艱難，再增加生產成本，對工業前途自然是個很大的打擊。社會部所訂的辦法未免有憐他人之慨之嫌。自工人這一方面說：政府既明白宣佈工人生活指數，則按指領取工資，自爲合法的權益，這特發動他們爲工業的前途而忍痛犧牲，事實上亦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政府恐惟有一方津貼資方，一方限令資方按新標準發放工資，庶勞資可以相安無事。我人之不能已於言者，政府再不能這樣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了。每次病急亂投藥的結果，總是自找麻煩，難道還不肯引以爲戒麼？

## 上海暫緩徵兵 改用募兵辦法

政府明令上海市暫緩徵兵，改用募兵辦法，我們很欣幸於上海人的特殊待遇。本刊曾主張停止徵兵，藉以增加農村的生產勞動，政府能逐漸向這方面努力，自然是種好的現象。但上海市獨受特殊待遇，恐怕又會弊多於利。戰爭結束後，因農村的衰落，農村的不安定，以至有人口向都市集中的普遍趨勢，都市中能對各方面的人口盡量吸收，那這種集中的趨勢實爲國家工業化的重要條件。無奈工業方面，維持現狀已感精疲力竭，如何能擴充規模，來吸納這許多流動的勞力？因此人口之集中，事實上祇有增加失業的嚴重性。其次都市房屋的分配，因人口之集中而發生了困難。所以，在目前的情況

活指數解凍以及上海市暫停徵兵，都是會使上海市人口激增的因素。當輿論對此，還應該早籌妥善的對策。

## 日本野 心難戢

日本將利用美國的羽翼，乘機恢復在太平洋中的帝國基業，這我們在本刊四期已有所報告。最近事實的表示，日本仍在向已定目標活動，而蔣帥偏愛日人的態度，亦日形露骨。英菲諸國，對此皆深感焦慮。吾國新聞界，也曾作有力的呼籲。要求國人注意這個事實。日本的計劃中，有一條特別關係吾國，即要求台灣的優先移民權。台灣係吾國的行省，其地位與其他省同。日人在此，會利用帝國主義的統治盡量榨取，於今未能忘情，尙欲重溫舊夢，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我們必須嚴密注意日本的動向，以防其死灰復燃。但最重要的，更望我國能極早建設，恢復安定的秩序，增加國家對外的發言權。

## 和平運動 略露曙光

中央接受參政會和平提案後，即召開國務會議，準備修正聯合政綱內關於先恢復交通線之一點。中共方面，對和平提案亦無反對表示。各方均注意於最近之政局動向，希早化暴戾爲祥和之氣。

## 經濟動向側 重收縮通貨

挽救經濟的危局，政府側重收縮通貨。八年來討論物價問題的論文，指責物價高漲由於通貨過分膨脹者，本亦爲有力的一派。此次決策之改變，當係受此項論調之影響。惟收縮通貨辦法，僅令地方事件由地方籌款，恐難收很大的效力，緊縮政費，自爲收縮通貨的一個方法。但中央不必要的支出，應亦在節流的範圍之內。單單責難地方，有失公允之處。而且地方事件由地方籌款，也不是真的節流，地方仍可增加雜稅，以爲補救。這樣，節流的目的未達，而人民的負擔未免要加重。因此之故，真正的節流，必須分析政費的項目，孰緩孰急，而後定裁減的標準。這項工作，能邀請參政會駐會委員及有名財政學專家共同討論，最爲適當。更有進者，收縮通貨，單靠節流，未易成大功。一般的政務費，已到了點綴的程度，可省的種類極爲有限。非設法開源，尤其收稅這方面，若不能澈底整頓，可以收回的通貨必屬有限。我們認爲收縮通貨的政策是對的，但收縮的方法，仍應公開的慎

# 再論和平的展望

公誠

各方人士，對於和平均抱熱烈的希望，而我們深知有效和平方案的提出，實有其主觀的心理的困難以及客觀的事實的阻撓存在。這並非說我們對於和平是不具興趣的。我們深深的相信，在目前的中國，政治雖呈五光十色之狀，而攪花樣的不過少數享受威權（不問是在朝的威權或在野的威權）的人，大多數善良的人民，始終沒有有效地表示他們的意見，以至兩方面都可以指鹿為馬地藉民意之名以爭統治地位之實。換句話說，中國的安定力量沒有發生安定的作用，這是變亂時常發生的原因。我們當前的任務，實為使安定的力量發生安定的作用。發生安定力量的是大多數普通的人，怎樣使大多數普通的人在政治中享受崇高的地位，怎樣使大多數普通的人產生一個與他們利益相一致的意見，這是致中國於和平的最有力的方案。

要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要毫無顧慮的解剖一切現實。現在我們無形中有許多忌諱，使問題都包紮在幾個假面具之中，這是中國問題不容易解決的很大原因。

許多人在想：目下的戰亂，實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實為維持現狀與推翻現狀之爭。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很少人予以分析，用春秋筆法，以內亂或內戰這兩個名詞來形容現狀的倒很多。其實這樣的咬文嚼字，對現狀並無一絲一毫的補益。內亂兩字，不過否認中共作戰的合法地位，內戰兩字，也不過承認中共有對等的地位。但打仗還是打仗，癥結一點都沒有解開。假使認為現在的戰爭的確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維持現狀與推翻現狀之爭，那戰爭就不是用呼籲的方法所可以挽回的了。因此，我們對於一般人心裏所想的問題，實在應該先提出來公開討論。

所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一定認為兩種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不過就我們的理解，並不覺得就這樣可以劃分鴻溝。尤其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實在是想用溫和的手段來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中山先生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也因為這個道理。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其目的當然在使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經濟力量逐漸趨於平等。共產主義者之目標，最少在目前的程度下，也不過能完成此項目標而已。蘇聯的憲法，「各取所需」這一句已改為「各取所值」。足證等差待遇的政策，在共產主義的蘇聯也祇能予以承認。中共是否將力行「各取所需」的原則，而否認一九一七年以來的歷史教訓？這我們尚不能得到明顯的證據。因此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說是兩種對立的思想，實際上是違反事實的。問題的中心，在於政府究竟行了多少三民主義，尤其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北伐成功之後，政府曾以土地法和遺產稅法為達到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兩大工具。在政策方面，他沒有違背革命的使命。可是實行的時節，却不能說沒有變質。在制訂法律的時候，政府並沒有規定一定期間內預期的效果，而執行以後，也沒有嚴格考核實施的成績。到現在為止這兩個目標事實上還是依然如故的被擱置着。說嚴格一些，或甚至還加速的走向相反的目標。尤其抗戰以後，資本的集中變成很顯著的現象。中產階級的崩潰，為抗戰八年來不可否認的事實，而這種崩潰的中產階級的資產，未嘗變成國家的資本，大部分是彼少數有力者吸收去的。現在對於政府表示不滿的，不一定是馬克斯所說的勞動大眾，而實際上是那被破壞的中產階級。

我們常常這樣相信：政府如能嚴格的實行三民主義，中共問題甚至可以不發生，就是發生了也不會變成嚴重的問題。英國政治上的智慧常常可以作最有力的證明。英國所力行的國策，不問在保守黨手裏或是在工黨的手裏，總是趨向於財富社會化這個觀點。當然，保守黨比較採取迂緩的

手段，但不至過分的反動。因此英國不會是個對於共產主義發生恐懼的國家。我們的建國綱領早經確定，與英國的大致採取同一步驟，但實施不能忠實，發生的結果就這樣的夭折！何以發生這樣不幸的現象，我們必須追溯自北伐以來的一段歷史，那真說來話長。但簡單言之，厥為政府的有力人士自身積聚了許多財富，以至國家的政策無法推行。在中國最奇怪的現象，莫過於法律是社會主義的而現實却是反社會主義的。立法的人士，縱使沒有完全依據三民主義以立法，大體還沒有走反對的方向。但一到執行法律的時候，常常是此路不通，法官的尊嚴，到底敵不過有力者的權威，由是法律變成裝飾品，甚至會發生與其目的相反的效用。由上所說，可見目前的戰亂，並不發源於思想的衝突，倒是維持現狀與推翻現狀這一個觀點，成爲僵局不易打開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問題的解答，也並不簡單。

所謂維持現狀，假使是指無條件的保全現在的一切，我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同意這個原則。尤其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人士，更不肯同意於這個原則。對於貪污，對於腐化，對於反三民主義的現實，沒有一個人能予以容忍。但所謂維持現狀指保全現在的政權，很多人還願意作考慮。這不是對於某一個政黨的偏愛，而的確還是因爲對於許多現實問題的估計。第一，推翻現狀的一切，所付的代價一定很大，甚至會太大，尤其戰後的中國，是否能負擔這樣大的代價實成問題。最近各方面發起和平運動，其原因亦在於此。我們曾經這樣說過：一想到中國，就要想到四萬萬多消瘦疾病的人民，而這四萬萬多人民實在再經不起抽血括肉了。第二，我們對於推翻現狀的主力——中共，也不能過分信任。他對於生命的不加愛惜，對於技術的不加珍視，這一種類於瘋狂的心理，很可以加長破壞的時間。

一般人的態度，願意在保持現在的政權的前提下切實實行改革現狀的政策。爲什麼這種意見沒有發生力量？一方面因爲人民沒有能具體的把這一個意見組織起來，一方面因爲政府還沒有改革現狀的切實表現。而後面一個原因可以說是更重要的。

說得更透澈一些，一般人要求不流血的革命，或者是說從上而下的革

命。他們並不是不肯爲革命付代價，實在因爲付不起代價。改變現狀，這是客觀的需要。而現時政府既沒有改變現狀的具體表示，大家又對中共不表示歡迎的態度，所以一切的意思都是躊躇的，一切的力量是中和的。這一種躊躇的意見，中和的力量，使國家長久膠着於混沌的局面之中。

政府一定要怎樣才具體的表示了他的改悔？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實際上很容易有個客觀的標準。我們說過：三民主義之所以沒有切實實施，因爲政府中的有力者自己積聚了很大的財富。這一種現象的解除，不獨使三民主義的推行非常順利，而且也表現了政府改悔的決心。政府本來是革命的政府，而所以變成衆人批評的對象者，完全因爲這個弱點，不是正本清源，很難挽救一般人的觀感。惟有下大決心，盡量的化私爲公，而後官紀可飭，法律可行，不僅觀瞻一新，即其餘許多問題，也可迎刃而解。現在政府常常有個遁辭或托辭，說他所以不能改革實因中共的威脅，這是政治上最大的矛盾。中共的所以有威脅，因爲政府不能自動改革，如何能說因爲中共威脅之故而政府即不加改革？避免中共的威脅，減少中共的威脅，祇有從政府自動改革做起。

我們的這一種期望，有人認爲無異希冀歷史中產生一個奇跡。但是爲了挽救我們的劫運，爲了加速達到國家建設的階段，我們都懇切的希冀這一個奇跡的產生。

最後，我們大多數的人民，我們是國家的安定力量，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命運抱一種積極的態度。兩極端的少數分子，沒權利來犧牲我們的血肉，更沒有權利葬送我們子孫的命運。我們要有一致的目標，更該爲這個目標而努力。

和平的前途，不能寄托於中共的身上，也不能對政府抱太大的奢望。和平的得到，在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力量能發生安定的作用。這是我們的態度，也是我們的觀點。我們始終希望於政府及中共之間能產生第三種力量，而這個力量必然會變成安定國家社會的巨大力量。這個力量現在已存在着，所需要的是組織，是有力的表現。對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寄以最大的期望。

# 美蘇衝突及其橋樑

羅志如

自前年大戰結束以後，美蘇的關係，時而緊張，時而鬆弛，去年上期情形險惡，十月以後，即覺好轉，現則又漸趨惡化了。這樣一鬆一緊的局面，有兩種解釋，一說這是蘇聯慣用的外交技術，有意把局勢弄得撲朔迷離，讓人捉摸不定，一說向來的政治局勢就是如波浪式的一起一伏，在最後破裂以前，關係總是時好時壞的。假如後說是對的，我們立即要問這個波浪式的演變是否有一個長期趨勢存於其間，直切言之，美蘇的關係是否終於要破裂，或者說得迂迴一點，美蘇利益的衝突和觀念上的鬥爭是否沒有調協的可能。本文並不想多作預測，而只在調協的關鍵上試作分析。

如果調協而需要一個調人或居間者，這個居間者所須具備的資格是很顯然的：第一，他本身的利益不與當事的雙方有深刻的衝突，第二，他所行的或相信的政治經濟制度亦不與當事雙方距離過遠，最好介於兩者之間，第三，他有極公正的態度，並能負起改造世界的責任，使當事雙方可以信服。在美蘇的衝突日益惡化的進程中，在大家都焦慮將來的嚴重後果時，全世界都在極力尋求一個調人，以來分解這個角鬥。在沒有理想的橋樑出現以前，許多人願望着英國來担當這個職務，也有人提到中國。現在讓我們先把美蘇的衝突加以論列，以便對其橋樑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 一 利益的衝突

從表面上看至少有三點美蘇不應該有很大實際利益的衝突：第一，兩國在地理上相距甚遠，不但不接壤，且有兩大洋相隔，自無疆界上的衝突（在這一點上，中蘇的衝突，自比美蘇為大）。第二，兩國都是沒有殖民地，也都一再宣言不預備要，自無爭奪殖民地之理由（在這一點上英國作調人不如中國）。第三，兩國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上的地位都不算重大，所以搶取國外市場，似也不應有劇烈的競爭（在這一點上美英的衝突反而大些）。

不過那些都是膚淺的看法，實則上述三點，都有問題。第一，美蘇雖不接壤，但在現今的交通情形下，尤其是在飛行及電訊技術特別發展的時代，地理上距離的遠近實已不成重要的考慮，而況美蘇在戰後各自的勢力範圍擴充以後，在歐洲的德國及亞洲的朝鮮，都直可說美蘇已接壤了，彼此間的接觸已極頻繁了。第二，誠然美國自讓菲律賓獨立以後，可說美蘇都是沒有殖民地的，也都是聲言不要殖民地的，可是美國人今天最疑懼的就是所謂蘇聯的擴張主義。看看蘇聯的鐵幕是在向外推展，不但席捲東歐，且更要求代管前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而美國在太平洋上所要的軍略基地，不但數目很多，且散佈亦廣，更將菲律賓的幾個基地作九十九年的租借，直把太平洋布成它的一個內湖。自然，兩方面的這些姿態都可以解釋為局勢演變的結果，而不是內在自發的因素，換言之，兩方面都是覺得情勢嚴重，不能不把安全地帶加以擴充，各自都認為是對方在以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強迫他人接受，因以併吞世界，統治全球，這即是說把兩方面勢力範圍的擴充都解釋為思想衝突的結果，這有相當的真理，但究不能完全掃去兩個帝國主義者鬥爭的嫌疑，至少不能否認在玩權力政治。第三，美國的輸出額雖然佔全部國民所得的成份不大（在一九三七年為百分之五，而英國同年則為百分之廿二），但其絕對的數值很可觀（去年約九十億美元），佔全世界貿易額的成份頗大。一般美國人認其輸出政策與其國內的充分就業密切相關，輸出業常雇用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這個數字的變化對於美國的就業情形大有影響，而美國就是想要以充分就業來確保其經濟制度的，所以她是希望各國都廢除貿易限制以便擴張她的輸出，（這幾天在日內瓦召開的貿易就業預備會議中，她正在努力於這個工作）。在這一點上她最感頭痛的就是俄國的國營貿易（和英國的帝國優惠制度），在兩次世界貿易預備會議裏，俄國都拒不參加，據說俄國對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雖已簽協定而迄未參加的理由，也都是怕在貿易上受到美國的限制。

制。美蘇不但在貿易政策上有此磨擦，而在原料市場上的爭奪也頗劇烈，尤其是中東的石油，實為美蘇所必爭，同時多瑙河流域的商務，也就是兩國角逐之場。

## 二 觀念的鬥爭

除中世紀十字軍的東征而外，向來的國際戰爭，多為實際利益的衝突而少有思想上的鬥爭。這一次的大戰就有些不同了，軸心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同盟國方面的民主主義都各有一套觀念和信仰，終致水火不能相容。大戰以後，民主國家算是勝利了，可是民主陣營立即分裂，又展開了新的思想的鬥爭，或者可說是舊的鬥爭的復活，而更形尖銳化了。

有人相信現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更甚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鬥爭，所以表面上美蘇關係雖然緊張，而骨子裏英蘇的矛盾與衝突實更為深刻，這一點，我們留待以後討論。現在我們既談美蘇衝突，即先集中注意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這個對立自然是歷有年代的了，不過今天更加露骨。據現實而論，資本主義重自由而共產主義重平等，二者又似乎不可得兼，衝突即由是起。

我們可先從民主不民主說起。本來民主這個名詞，至今還沒有確切不移的涵義，英美人士大多認為蘇聯的辦法是不民主的，而蘇聯也確認英美的制度也未必民主，兩方面都在爭取民主，但又覺彼此不能相容。最有趣的在這次大戰前英美認蘇聯是狄克推多制，是不民主的。到了戰時，蘇聯與英美共同對軸心國家作戰，蘇聯就被共認為民主國家之一。到了戰後，英美似仍認蘇聯為民主的，因為蘇聯是參加聯合國的，而聯合國的會員都是民主的，佛郎哥的西班牙是不民主的，故不但不讓她加入聯合國，且要對她撤回使節。可是到今天局勢緊張，蘇聯雖仍是聯合國的會員，英美人又大多認其為是不民主的了，不過似尚未請其退出聯合國的地步（美國一議員已有此動議）。

一般作者往往把民主與自由兩詞相提並論，似以為民主不一定有自由，自由不一定是民主，因此有人把民主解釋為平等，平等與自由也是常聯用的名詞。如果照這樣推論，蘇聯有平等而少自由，則是惟有蘇聯是民主的，這個結論自為大多數人所不能接受。這個似是而非的結論顯然是沒有

分開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來看。蘇聯的制度有更多的經濟平等，英美的制度有更多的政治自由，這是公論，但不能由此判定誰為民主誰為不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英美有政治民主，都是民主，如果說真正平等必是自由的，而真正自由的又必能彼此平等，則英美與蘇聯在民主上實都有愧色。

其實美國人最自豪的就是他們的平等，林肯早就說過，美國人是生而平等的，實則美國自獨立革命成功以後，他們就很自滿於他們的平等社會，所以今天對於任何方式的集體主義他們都不喜歡，更不相信俄國新的革命會有像他們那樣的成功。換言之，美國人覺得他們真是既平等而又自由，他們的民主是一個既成的事實，只消推廣及於他國，全世界人民就都能平等自由了。

同時蘇聯的看法認為每人都有一張選舉票那種形式上的平等，對於全民的幸福，無關緊要，甚或那是資產階級的詭計，以掩飾他們以少數人剝削多數人利益的事實。至少蘇聯認為真正的民主，乃是能注意到大多數人的幸福的，而最初步最切要的幸福乃是要人人都有飯吃，不然，人民生活尚是問題，拿着一張選舉票實是啼笑皆非。至於一個政府，只要它能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所取的方式是無關宏旨。而且蘇聯聲明它現時所行的制度還是一個過渡的，將來真正達到馬克新列寧所說的共產社會，那時人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國家亦將消失，世界進於大同。我們由此可知蘇聯的共產主義不會始終限於俄國，而也是要推及於全世界的。

對於上述各點，英美人的反辯認為有飯吃充不如有選舉票之重要，因為人類究竟不是牲畜，不光管溫飽，而要注意於意志的表達，個性的發揮，所以說「不自由，毋寧死」這是人類獨具的特徵。蘇聯政府縱能顧到人民的利益，也無非是代辦人民的利益，而且一經代辦即有永遠繼續這樣作的可能。再則所謂經濟民主，自然包括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中最要者莫如自己決定所要消費的東西及其分量，和自己決定所要作的工作及其久暫，換言之，就是要有消費自由及擇業自由，在蘇聯這些自由就相當缺乏，（這也許是計劃經濟技術上暫時的缺憾，將來可能避免的，即是說有了經濟平等即能有經濟自由，關於這點，現猶在專家討論中）。

## 三 英國的橋樑作用



撇開實際利益的衝突不計外，如果自由與平等是二者不可得兼的東西，那麼美蘇的裂痕只有擴大不能彌縫的。反之若殊途可以同歸，自由與平等可以兼顧（我們實無理由相信其不可能，因為前面已曾談到真正的自由是平等的而真正的平等是自由的），在制度上儘管不同但可達相同的目的，既然目標相同，則就有讓對方一試的耐心。現今許多人的判斷，說英國現時的辦法是人民既有飯吃又有自由，則是兩都能相當顧到，實居於美蘇之間，故華萊士此次到英國去，所作的演說就是在敦促英國在美蘇間堅守中立以發揮其橋樑作用。

前已提到有若干人士相信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衝突更甚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那是過於重視過去英蘇傳統的關係，因為英蘇都是歐洲的國家，不但過去曾以兵戎相見，而且今天實際利益上彼此衝突，也較美蘇為多，所以不但我們前常以英美相提並論，而且的確蘇聯仍認英美是一個集團。在他一方面，英國雖然勞工黨上台，在貝文主持外交之下，與蘇聯的關係的確並未改好，且更發動一社會主義的關係組織（第五國際）以對抗蘇聯。

不過無論如何從思想或經濟制度的本身上來說，英蘇之間的距離，不如美蘇之大。迄現在為止，雖英國的制度更接近於美國，然而照目前演變的趨勢，英國與蘇聯的距離，會日趨減小，而與美國間的距離會加大，直至英國真正的居於他們兩者之間，那時英國的橋樑工作就能充分發揮了（據五月十八日倫敦報載英國已不滿意於美國的金元外交，將被迫而轉向蘇聯求助，並預料六個月內貝文外相將出人意料與蘇聯從事折衝）。

勞工黨執政的英國，其實行的政策可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新資本主義。一般只看到英政府在產業社會化上的運動，而未充分注意其社會安全的措施。年來英國為什麼沒有如美國那樣多的工潮，不僅政府在協助勞工，資本家也在幫勞工的忙，對各種社會保險，雇主也有一份負擔，這也非全為政府強迫而使然，乃自認為在勞資關係上是長開明的政策。英國現任商務部長克利浦斯爵士在一次演說中曾說：「英國勞工政府是要在工商界成爲第三夥伴……它將造成一種有秩序的環境，使民營企業可能對國家幸福有最大的貢獻，它將與資方勞方站在第三夥伴的立場以處理一切問題」。如果這三夥伴的合作成功，就是代表新資本主義的一方面。

現今還有不少的人相信資本主義所表現出的經濟不平等，可以由政府實行重稅及大規模舉辦社會事業，以使其平，這也是英國比現在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做得多的一點，英國到今天仍是世界上租稅最重的一個國家。其國內貧富不均的現象，日趨於減少，據最近英國財部白皮書的報告，該國最富足（每年除納稅外尚有六千鎊以上之收入者）之人數，已從一九三九年之七千人減至本年僅有四十五人，純收入爲四千鎊以至六千鎊者亦僅有八百四十人（在一九三九年則有一萬二千人）。在他一端納稅之收入在一五〇至二五〇鎊之間者則從一九三九年之四百五十萬人增至本年之七百九十五萬人。再則英政府對社會事業也特別注意，在本年預算中全部支出約三十一億八千萬鎊，而社會事業的支出即有四億四千萬鎊，約佔總數百分之十四，誠如財長道爾頓所說，此實爲劃時代的。由社會安全制度的推行，以使人民自出生以至死亡都能不致有貧乏的恐懼，如果這一點完全成功（美國也在向這方向走）也可以說是新資本主義另一方面的表現。

不過最普通的說法，勞工黨的英國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本來社會主義這個名稱是很廣泛的，俄國名雖爲共產主義，實則也爲社會主義，不但在蘇聯名稱的本身上就加有社會主義一字，即蘇聯政府也承認現今所行的是「一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制度，至少還沒有達到馬克斯列寧所主張的共產社會（有兩點不同，一則尚未達到各取所需，再則國家的權力仍然很大）。自然在經濟平等方面，今天俄國已較英國更進一步，而在產業社會化方面，俄國更是在最前線上，可是這也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在思想上，在制度上，在爲全民的利益着想上，兩國間並無根本的衝突。

很不幸的，蘇聯在革命後，開始的措施就來得很激烈，與英美的距離都很遠，因此引起外界不少的恐懼，猜忌，和仇視。雖然兩方面經過大戰中的合作，但是彼此間這種不愉快的情緒，還未泯滅，可是今天在英國有不少人士對蘇聯已漸漸了解，尤其工黨人士是大多同情於蘇聯的。英國名社會主義者柯爾（Cole）曾說：「英國工黨深知英蘇合作乃爲社會主義前途所不可少的基礎」，英國如能與蘇聯更爲接近，則就可以在英蘇間有真正的中立，而發揮調協的作用。實則英國今天的外交也只有兩途可走，她不能靠武力以與美蘇任一方抗衡，她也不能聯彼以倒此。她或者以其思想與制度介於兩者之間，而使美蘇都有所做效，以使彼此趨於接近而減少觀念

上的鬥爭。她或者要更努力於西歐集團，拉攏法比瑞荷等國家以與美蘇成一三角鼎立之勢，由是更能嚴守中立，既不服務於美國的金元勢力，也不追縱天主教集團而為反蘇的工具。英國在兩方面的成功，實都大有裨益於世界的和平。

### 結 論

作美蘇的橋樑，英國雖不是理想的，確是够格。也有人提到中國來担當這個職務，雖非近於滑稽，可是我們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誠然在若干方面我國作調人的資格似比英國更勝一籌：第一，我們與美蘇在傳統上都無惡感，第二，都是不要殖民的國家，因之，我們與美蘇在這一點上都無衝突，第三，在國際市場上與爭取原料上，在短期內我們都沒有與他們磨擦之必要。可是我們不如英國的地方太多了，尤其缺乏作調人的要件：第一，我們自家屋內尚無秩序，我們對自己的事，尚有不能自主之慨，在

國際關係上我們尚未取得主動的地位，實無力以担當安定世界的責任。誠然也有人批評英國的外交是在看華盛頓同華爾街的顏色，也有說此次在莫斯科會議中，貝文無非是馬歇爾的隨員，可是英國的立足點究竟是穩定的，國內是差不多一致的，而其國力也在迅速恢復中，不但它有左右全局的能力，且確有餘力作這個企圖。第二，說得簡切一點，我們既無經濟平等，亦乏政治自由，我們在宣傳的主義上雖有民生民權，然而離開制度化的境地尚遠得很，隨處都是矛盾混亂，別人都看不清我們究竟走的什麼路線，還能起什麼橋樑作用。實在說來，今天我們與美蘇都已接壤，不幸而美蘇真已破裂，我們即將為首先爭奪的戰場，所以我們要作美蘇橋樑，實比英國更為迫切，因此，我們須得努力向英國所循的方向前進，先把自己弄成一個既自由而又平等的國家，自然就有安定世界的力量。

三十六年五月於重慶

# 經濟危機的處方

吳貞盒

在本刊連續數期內，曾一再強調中國今日問題的中心，是橫在社會之中而為人人所憂慮的經濟危機。這問題儘管人人憂慮，迫切地期待着一種解決，但政府始終舉棋不定，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辦法來。前者政府會集中精力緊縮通貨，其結果不過緊縮了生產，而在財政上的膨脹，却終於無法避免。影響所及，非但沒有阻止物價上漲，反而造成了空前的恐慌。繼之政府來了一套「緊急措施」，但是緊急措施到底不過是為緊急而措施，然就現實而言，實際的問題而言，真正要解決當前的困難而言，這都不免文不對題，隔靴抓癢。因此人民到了今天，還依然在期待着，惶惑的期待着，一套切實而有效的辦法。期待的時間確已是相當的久，於是人民不免開始懷疑，懷疑政府到底是否有那樣一套，能否有那樣一套切實而有效的辦法

。這懷疑，這憂慮，現正隨着時間繼續演變，擴大影響，在經濟方面已造成了更大的危機，在社會方面是極度的不安。政府的研究與會議，該有具體的結果了吧！

回憶在三黨聯合政府組成的時候，政府會申稱要逐步實施「既定方案」。『既定方案』到底是些甚麼，人們無一個不想早於早早知道，但是，時間過得很快，在這一兩月之間，花紗暴漲，米糧飛升，而黃金美鈔的暗盤更躍進了驚人的價格，可是「既定方案」依然沒有消息。於是這方案到底是有是無，便成了普遍的問話。現在財部透露消息，說：征收財產稅計劃已經起草完竣，即將提交全國經濟委員會通過，再送立法院完成手續。我們問：這是不是所謂的「既定方案」，或者它的一部份。我們希望這是



全部既定方案的前奏，還希望不日可以看見全部。計劃起草的先生們加倍努力吧，早些日子把既定方案定出來吧！時間已經是迫不及待。有人說：「中國目前政治經濟的危機，已使中國面臨大革命的前夕」，姑勿論問題是否如此嚴重，時間總是解決問題的主要因素，企圖拖延絕不是好的辦法。譬如公教人員加薪與生活指數凍凍凍問題，就是因為拖，已經拖出了罷工罷教罷課……無數動亂不安的現象。這該是一次具體的教訓！我們覺得好辦法固然比壞辦法妥善，然而有辦法總比沒有辦法好。

假如我們問甚麼才是好的辦法，當然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見解，其中有不少值得爭辯的地方。然而不管我們怎樣講，我們總不能忽視現實，不顧病微的現實情形，就隨便處方下藥。今日中國的經濟病象，浮在表面的是通貨膨脹與物價不斷的暴漲。我們如其要推究這種現象的原因，一面固然是由於財政的不能平衡，而另一面則是由於生產的急劇減縮。這兩者之間實是在相互因果的，因為生產減縮，人民衣食不保，逼完完糧納稅；反之，財政不能平衡，因而通貨膨脹，至使生產與生產力轉入不正當的消耗途徑，既毀壞了生產的正常結構，也擾亂了生產的正常軌範，當然生產隨之萎縮。這兩種畸形力量的發展，如果任其演變，勢必會重複着不斷的迫使通貨繼續膨脹，物價繼續上漲，其結果非演到通貨與全面經濟同歸於於崩潰倒場是不會休止的。

今天假使想要挽救當前經濟崩潰的現象，還要使它迅速而有效，我們起碼要提出三件事來喚起政府當局的注意。

第一、政府應該立即整理幣制——關於這一點，丁洪範先生在本刊一卷三期「期待法幣崩潰挽救經濟崩潰」一文中，說得非常明白。我們知道有許多人是贊成立即整理幣制的，而政府也曾一再申明不願立即整理幣制。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在法幣價值沒有穩定之前，驟然從事幣制的改革，新幣的穩定將無法求得，新幣的信用亦無法維持。他們說，這時改革幣制發行新幣，將無異於數年前的發行「關金」，他們都會同樣地走上法幣的命運，整理將是徒勞而無功。他們的意思是我們等待，等待到財政可以平衡，通貨不需膨脹的那一天，於是幣值可以穩定了，那時再拿出一種新幣來換進舊幣，萬事都妥善了。更明顯的說，他們是要我們等待內戰結束以後，交通恢復了舊觀，生產走上了正軌，社會有了秩序與安寧，那

時再來談改革幣制。然而這種如意算盤是打不通的。今天可以說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內戰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和平多少是絕望了；其實我們天天都在希望明日就可以結束內戰，然而事實上這也許可能繼續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總之，在戰爭繼續存在的時期，財政平衡萬無可能。而且縱使戰爭立即可以停止，在短短一兩年的整理期中，誰又能相信財政能夠求得平衡？但是像現在這樣通貨繼續不斷的加速度膨脹，到底能不能使我們再等待三年五載，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所以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個選擇：看我們到底是願意選擇在物價穩定後來改革幣制，抑或在幣制改革後來穩定物價。我們雖然可以說問題的重心是在有無辦法來穩定物價，但是我們總覺得在幣制改革後來穩定物價，希望要大些。至低限度，前一個辦法，即是政府採取的現行辦法，是失敗了，而且失敗之餘，助長了投機居奇的現象，因而便宜了那些官僚豪門的資本家。後一個辦法，如其能施行，起碼可以借此調整公教人員待遇，恢復部份的公道，安定部份的人心，並且以其能使利息降低，保不定還可以成為發動生產的原動力。但是為着要確保後一個辦法的成功，我們不能不對穩定物價的問題加以考慮。如其要求澈底的穩定物價，政府在過去玩那些把戲是沒有用的，今後必須誠誠懇懇的一面求財政上的平衡，另一面盡可能的去幫助，不要再破壞各種生產上的努力。

所以第二點，政府必須要迅速而有效的求得財政上的平衡——當然誰都知道造成財政上的龐大開支主要的是軍費。果其我們國家的仁人志士們，大家能犧牲成見，彼此客客氣氣的以和平為重，那是再好不過了。但是事體並不像我們看的那樣簡單，也就沒有法子。現在事已至此，我們姑不問這戰爭是為誰而打，我們起碼可以說，這也應該一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老原則，來求得一種比較合理的平均負擔。我們總不能說，既要老百姓出死力，還要他們籌軍費，同時還讓那批豪門市儈從中操縱，大發其內戰財。現在總算好了，政府要開始征財產稅了。我們除了希望這種稅趕快實施外，還希望數額是那樣大，足以抵銷一切軍事費用，而且起征點相當的高，（起碼五億以上）不至把苦難的中產階級以下的人們又拿來作剝削的對象。其次，為了平衡財政，政府似乎還應該盡它最大的努力去節省開支，減低浪費。關於這，我們起碼可以舉出三件事來說：（一）沒有會

體的營造事業可以不必辦，如修紀念塔，營房之類；（二）肝肢應酬機關應予取締，如某某訓練機關，某某會之類；（三）虧本的國營事業宜提早拍賣。據說今日的國營事業有很少不虧本的。國營事業虧本這一筆賬當然是要計在國家的財政開支上，同樣的影響到財政的平衡。這且不說，最可惡的還是這些國營事業，可能阻礙到社會生產事業的正常發展。為什麼？因為這些國營事業儘管虧本，反正有政府作後台，所以範圍不妨繼續擴大，出品無妨繼續運進市場，去造成不合理的壟斷競爭，使社會私營事業終於自形能力薄弱，倒閉投誠。所以今天即使不為平衡財政收支，而為消滅不合理的壟斷競爭，鼓勵民間生產，這些所謂的國營事業，似乎也應該提早拿來賣掉。

平衡財政收支到底還是穩定物價的消極辦法，屬於暫時性的。為長遠打算，我們還是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恢復生產，這便是我們要討論的第三點。提到生產，我們勢必想到建國問題。這個，當今之世討論的人很多，討論的範圍很廣，討論的根據也很豐富。談起這個，每每使我們聯想到這國的五年計劃，那國的三年計劃，有無數的崇高理想，深遠的目標，真是一言難盡。但是在這兒，我們不打算對於這種未來的建國大計妄參末議。我們只想卑之無甚高論，唱導一下恢復非常「低調」的生產標準。今天我們固然應該立大志，有遠見，為百年大計而設想，可是我們也不可太忽略了我們眼前的嚴重問題。我們抗戰結束了兩年，喊了兩年的復員，到現在儘管我們的人大體復員了（這也有問題），而我們的生產可不像復員了的樣子。我們覺得在今天生產尚未恢復戰前的水準，似乎還不配高談建國的百年大計！其實在陷於經濟絕境的今天，我們如其能得到戰前的經濟境界，豈不滿足味了？我們看各大都市的工廠，在戰前動着的，今天有幾個煙囪在冒煙；我們看農村的田野，在戰前耕種着的，今天有幾處在生長禾苗。我們今天不要妄想立刻趕上歐美工業化的程度，也不要妄想增加一所新式工廠，只要能使都市原有的工廠動起來，農村的田野耕耘起來，我們已經可以算是有了不起的成就。這個課題應份不是很困難的罷！

現在我們不要再談「建設」這一類漂渺、空洞、言大而誇的問題，我們試姑且來認識認識橫在我們眼前，簡單而滑稽的具體現象。在都市裏（尤其是在上海）我們現在有的是閒散的工廠，閒散的工人，閒散的資本，

也有的是嗷嗷待哺的消費者，但是不知道為甚麼這些工廠、工人、資本與消費者，順豎不能湊合在一起，結果我們會讓工廠封閉，工人流浪，資本進入投機市場而消費者各自去啼饑號寒。政府休要想建設歐美式的近代中國，果其能設法把這些閒散的工廠，工人與資本湊合在一起，使消費者得到起碼的生活，這已經算是功德無量了。我們回頭再看我們的農村，一樣也有不少閒散的農田與閒散的農民，但這些也一樣湊合不到一起。當然他們需要簡單的房舍和簡單的農具與耕牛，然而這到底比修薩凡奇水閘，甚至比修首都電燈廠要來得輕鬆些。可是人們偏偏喜歡這些時髦玩意，花大錢也要喜歡那些時髦玩意，而不高興這些農民，花小錢也不高興這些農民，又有甚麼辦法呢？

趕快恢復戰前的生產水準，是我們低調的主張。我們不敢高調，因為在困難重重的今天，高調如其不是空話，也是苦人以所難。但是不幸得很，就是這點低調的要求，經了兩年的時間，我們的經濟大國手非特沒有辦到，簡直就不會放在眼中。大國手們忙的是黃金政策、外匯加價、紡織托納斯！無怪人們懷疑豪門的打算到底還是為的他們自身的利益。可憐那些從事生產的忠實老百姓，兩年以來始終沒有得着任何方面的照應，只落得自生自滅而已。寫到這裏我們看見「張院長談經濟改革」的消息，說：「本人所草擬之經濟改革方案，為安定人民生活，完成經濟建設，係全面經濟政策之改革，具有治本永久性」等語（見上海六月九日新夜報）。這該是「既定方案」的具體化，「既定方案」的揭幕罷。在我們沒有看見全部方案的時候，我們不敢妄議。但既「為安定人民生活」，我們暫時不能不為老百姓慶幸，至欲「完成經濟建設」云云，我們誠虔的希望這不會又是一紙的具文。

我們在上面提出的三點意見，實在不是經濟改革的大計劃，而是挽救經濟危機的一點小小的主張。拿全面的經濟來說，這不過是經濟改造的「開步走」，我們應該走的路還遠得很。我們不是不希望政府有大的氣魄，作一翻驚天動地的經濟改革，而是覺着你總得要有「開步走」的決心，然後纔能談得上其他呀！假如這點基本決心都沒有，其他任何一套的大計劃都終不充是紙上談兵，儘管說得熱鬧，其實沒有那一回事。

# 行憲的條件

鄒文海

中華民國的憲法正式由國民大會審查通過了，而且決定從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開始實施，這是可喜的事情。在國大開會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有幾件事值得擔心。第一是兩個政黨未能參加，很怕因未能集中各方意見之故，失掉各方對憲法的信仰。第二是會議中爭辯的很利害，時時有因小失大的危機。這種難關大體克服了，兩個政黨雖沒有參加，兩個政黨平時的主張是受重視的，因為討論的範圍，盡量不超出政協的決議。至於辯爭最激烈的問題，因為刪除國都這一條而不復存在。當然，我們不能說憲法已得到理想中的成功，但因此而得到憲法的開始，總是歷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事件。

許多人批評憲法非驢非馬，其實這個問題不算嚴重。沒有一國的憲法不是在妥協中產生的，既是妥協的結果，自然各方面的主張都接受一些，所以講不到理論的貫徹。美國制憲中碰到南北兩派的對立，以至憲法條文中不得有非驢非馬的現象。法國第三共和時代保皇黨的勢力尚盛，關於總統的規定，不得不亦有其矛盾之處。我們的憲法，這種缺點不能說沒有，而且有的還非常嚴重，實行時甚至可能有窒礙難行的困難。不過憲法雖尊嚴，並不是完全不能用正當手續修正的，所以歷史的教訓，自然會去除這個缺憾。我們若參考各個國家憲法的歷史，實在覺得這一點是不值得擔心的。美國側重邦權的憲法條文，至今未加修改，但聯邦的優越地位，却變成美國今日不可動搖的原則。憲法有如一枝植物，祇要讓它有生長的機會，插下去時候傾斜的姿態一下子就會自己矯正過來的。

關於憲法的內容我們此時且不加推諉，我們所問的，憲法實施之日，是否憲法就有了保障？假使說還沒有，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方法使憲法成功？這應該是行憲年最重大的問題罷。

樂觀者的看法，總以為有了憲法就有憲治，這實在把憲法看得太高能了。法國大革命之後，自一七九一年第一次憲法完成後，一連串的又制訂

了十幾次的憲法，一直到第三次共和國方始有經久的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始終在動盪之中，時而君主立憲，時而民主，時而執政，局面的不安定，使得每部憲法不能維繫人心。論內容，法國革命時期的憲法有相當完備者，最少都比第三共和國的要完整和澈底的多；論制憲機關，通常均由人民所特別為制憲而選舉的國民會議捉刀，最少不比第三共和國的輕率。從這一事實，可知憲法的完整與否，制憲機關的合法與否，與憲法的壽命實在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憲法的產生，並沒有使不安的社會入於安定。反之，不安定的社會，却常使憲法中道崩殂。

我們國家的制憲歷史，相類於法國者極多。自辛亥約法以至今日，雖無百年的長久，却也忽忽過了三十六個年頭。時而天壇憲草，時而袁氏約法，時而民國十二年的賄選憲法，時而國民政府的約法，舉其大者，已有這樣繁多的名目，再從滿清末年的十九信條數起，更要使人不能記憶。好幾次制憲的嘗試都是失敗的，而且就是憲法制成了也沒有改變什麼政治的局面，更證明憲法不能安定政治，而祇有安定的政治才可使憲法有生長的機會。爲了這個緣故，我們相信各黨各派的相忍爲國是第一個行憲的先決條件。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始終在多難的局面之中。始而是軍閥的跋扈，繼而是北伐革命，再繼而是對日抗戰，客觀的環境既這樣不安定，任何部憲法都不能在這樣的土壤中生根。我們相信，憲法必須由多種政治習慣來加以維繫，而不安定的環境，實在培養不出什麼政治習慣。英國自光榮革命以後，因爲政治安定，好多政治原則均演化成爲政治上根深蒂固的習慣，由是英國就有了一部不成文憲法。我國因政治不安定，每件事情都是特例，都要用特殊方法解決，由是政治上既無習慣爲之指導，更無原則可以遵循，以至每次制憲的企圖，均要歸於失敗。

政治環境的不安定，這是憲法失敗的主因。憲法內容之合理與否，制憲會議的合法與否，倒還是次要的問題。憲法不過揭示若干條建國的大綱

備，本身並無執行的力量，這是誰都知道的。美國雖說有護憲機關，但最高法院的解釋權，究竟防止不了十九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不安定的政治現狀，使國家中各種有力量的團體，都不能恪守憲治中的原則。憲法所定的保正常狀態中的規則，在不安定的時期往往不能發生效用。任何意圖傾覆現狀的團體以及應付這種團體的政府，他們都不會顧到憲法的條文的。亂世小民，固然深感於沒有法紀的痛苦，但要想政治納入憲治的正規，還得先從安定政治入手。

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是不容易產生憲治的場合。抗戰雖然結束了，而經濟的險象，反而日益加深。兼之黨派的爭執，各行其是，戰禍有蔓延的可能。在緊急狀態之中，就是有意治習慣的國家，憲法也往往會被擱置一邊，不受重視。那我們這個毫無憲治習慣的國家，如何能以一部新憲法來約束一切的例外？軍事行動沒有停止之前，「需要不知有法律」往往變成政治上的最高原則，對於憲法的規定，許多時候是無法遵守的。舉最簡單的例來說，人民權利這一章，很難於兵荒馬亂的時期發生實際的作用。這樣一來，憲法一定常被變通；而憲法的尊嚴就說不上了。

我們始終相信：政治中祇有實至名歸，而決不能名至實歸。因為這個道理，祇有先造成法治的空氣，而後方可有憲治，決不能以一個憲法來抵制種種不守法紀的現象的。大家沒有守法的習慣，頒布一次憲法祇是再來一次破壞憲法。尤其憲法，它約束的對象是政府的重要負責人員，它精神的能否貫徹，全視這般人的態度而定。國家之內，人民與人民的關係，有民刑法為之規範；普通公務員的行動，有行政法為之規範；政府高級官吏的行動，就憲法為之規範；所以國家而沒有憲法，對於政府的高級官吏，未免過於寬縱。可是一有憲法，則如何使高級官吏遵守憲法，却成了一個極大問題。其他的法律，我們可以要求人民遵守，普通公務員遵守，而憲法則非由政府高級人員先遵守起不可。因之憲法的實施，先應養成政府高級人員的守法習慣。而這種習慣的養成，又非有政治上的安定環境不可。政治的走上規道，大概都要從財政預算這一點做起。可是在戰亂時期，軍費的擴張會出乎想像之外，由是預算雖然通過了，不得不以命令變更這種預算。這樣，豈不當初者自己先違背憲法的精神，憲治的根基又從什麼地方產生？

我們研究各幾個國家的憲治歷史，人權之爭固然是大題目，而財政的受控制實為憲治成功的基本條件。政府是享有威權的組織，人民祇是理論上有權利的團體。理論上的權利，往往抵敵不過實際的威權，古往今來有統治權的人，你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亦好，你說他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亦好，他有武力作為後盾總是事實。至於人民，雖然被譽為國家的主人翁，但完全是一盤散沙，而且就是組織起來也不是一種武力。因此人民或其代表真真要政府聽話，非扼政府之咽喉不可。扼咽喉的方法，就是人民或其代表能控制政府的財政。日本雖然頒佈了憲法，可是議會沒有控制財政的全權，以至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所行的始終是重臣政治和軍閥政治。鑒於這個歷史的事實，我們很深的相信，憲治之始必先要爭得人民代表機關控制政府財政之權。預算通過以後，萬不能以命令或手諭變通預算的規定。關於這一點，在內亂狀態之中，什麼人能保證做得到呢？

混亂是法律的終止，沒有人能否認這句話的意義。不問那一黨那一派執政，在混亂狀態中不會有嚴守法律的決心，那幾乎是沒有例外的。混亂的局面之中，守法者無異自己束縛他的手足而聽憑旁的人來殺害，聰明的人決不願意作如是決定的。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更堅信憲法不能終止變亂，而祇有和平可以使憲法得一生長的機會。愛好憲法的人，還是先努力於促成和平的運動！

在目前的客觀狀況之下，談憲治簡直是種諷刺。我們應該問：還是中共的行動合於憲法的精神？還是政府的行動合於憲法的精神？無數的學生逮捕了，我們震驚於所謂人權保障的神聖！但假使身臨戰鬥區域，看到大批的人民被驅迫走上屠宰之場，那我們又要覺得僅僅為幾個學生呼籲之過於仁慈了。其他破壞憲法精神的地方，真可說隨處皆是，豈僅人權不得保障一端而已。現在的境遇，我們真覺得權利和自由是種過分奢侈的東西，因此我們相信憲法縱使有鍾馗的神力，也驅除不了滿地的魔鬼。我們願意切切實實的談如何來改進這個政治局面，我們願意切切實實的來計劃復興與建設，我們更願意切切實實的來打開這種混亂的危險局面，到大家願意放下屠刀的時候，憲法差不多會誕生了。

# 我們需要一條和平革命的陣線

丁洪範

——導使學潮的洪流成爲建國的主流——

和平是舉國一致的呼聲。

革命又是舉國一致的呼聲。

中國既需要和平，又需要革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中國既需要和平，又需要革命，而兩者又是舉國一致的呼聲，爲何既不能和平，又不能革命呢？這是因爲呼籲和平的時候忘記了革命，呼籲革命的時候排斥了和平，於是和平歸和平，革命歸革命，各不相謀，所以落個既無和平又不革命的局面。

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之下，和平與革命是有其不可分性，即非和平不能革命，非革命不能和平。必須革命與和平連在一起，乃能達到這雙重的目的。革命與和平連在一起，就是和平的革命。只要全國的呼籲和平者和倡導革命者澈底明瞭革命與和平的不可分性，起而結成一條强有力的和平革命陣線，和平革命的雙重目的立時就能達到。否則，天下洶洶，大混亂與大屠殺千百倍於今日將會接踵而生，其禍患真正不堪設想。

反饑饉與反內戰的呼聲最近由學生羣中吼出，霎時響遍全國，宣傳請願遊行示威，形成一般奔騰澎湃，不可遏止的洪流。這個和平運動表面看來似乎由青年學生包辦去了。其實除了那些極少數別有心肝者外，舉國上下誰不祈求和平？工商界是厭戰的，農民是反戰的，公教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則痛恨內戰，士兵們尤其仇視內戰。內戰這壞東西實在是被千呢萬罵的。就是那戰鬥的雙方也誰不以戰鬥的責任加於對方，而自居於呼籲和平者之列。所以我說和平的呼聲是舉國一致的。

假如舉國上下不需要和平，而只有青年學生需要，這和平運動就根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會很迅速地壓下去；即使不去壓，因爲青年人的「五分鐘熱心衝動」也會很快地消沉下去。這就根本不能成爲一種運動。可是這是舉國一致的要求，其他各界，尤其是公教人員，因爲有種種的顧忌和牽掣，不便或不敢發爲要求和平的行動。青年學生的顧忌少，天真不

失，乳犢不畏虎，「春江水暖鴨先知」，於是先知先覺者的地位發爲行動了。社會需要和平而竟畏葸不敢要求而讓青年學生去犧牲打衝鋒，這是社會對不起青年之處。若干衣冠人士非獨不敢呼籲和平，甚至連自己天經地義應享受的生活指數報酬亦不敢聲請，而是煩勞學生代爲呼籲，好不愧死人也！學生既起而呼籲，舉國上下又已一致響應，爲何和平始終不能實現呢？這只是只呼和平不顧革命的緣故。

不管目前內戰的真正動機何在，即爭王爭霸，或救國救民，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存在着是毫無疑問的。這客觀的事實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革命尚未成功；非獨尚未成功，而且離革命的目標愈來愈遠。在孫先生提倡革命的時候，社會上只有大貧與小貧，沒有顯然的貧富兩個極端的階級。現在呢？少數的富者變成極富，而廣大的民衆則陷於極貧。本來還有許多不貧不富能獨立爲生的中產分子，現在非降爲赤貧受人踐踏，即變身投奔依附軍閥官僚豪門資本家爲家奴以爲生。在孫先生提倡革命的時候，官還是官，商還是商，官商的界限是顯明的。現在呢？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似官非官，似商非商，亦官亦商，亦商亦官，以政治的力量（包括軍事）發經濟財。以經濟的力量（包括金融）操政治權，官官商商，商商官官，官商商官，混淆不清，既行經濟的剝削，又施超經濟的掠奪，於是加速地使官僚資本變爲豪門資本，大魚吃小魚使中產階級變爲無產階級，當今社會貧富的兩極就是這樣造成的。

孫先生提倡三民主義革命其目的對外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對內在求人民之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即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人民經過八年抗戰受盡千辛萬苦，經過二十年「訓政」喪盡種種權利自由，滿望抗戰勝利，國政結束，做個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民。詎知抗戰實業，流汗流血，肝腦塗地的結果，却造成少數官商合一的活財神，一隻手提着美製的槍械，一隻手握住美式的鈔票機，希圖在三姆大爺的轄下，安富尊榮坐統治者的



職位，而廣大民衆則在饑餓線與死亡線之間爭死活。這個景象，非獨在野的人民和黨派認爲不能忍受，而在朝的黨派亦認爲不能滿意。國民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尤其是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施政的責難與激辯，及歷屆所通過之政綱政策及議案，俱證明在朝黨對於革命的呼籲。非獨國民黨呼籲革命，而握有實際治權的行政首長亦以革命領袖自居，口口聲聲呼籲革命。所以我說革命的呼籲，不管是真是假，也是舉國一致的。

舉國上下既一致呼籲革命，爲何「革命尙未成功」，有勞「同志仍須努力」呢？這是因爲革命者忘記了和平的緣故。

只要革命的因素存在，即統治者在政治上有利，在經濟上有利，以政治上的權掠取經濟上的利（即官僚資本），再以經濟上的利鞏固政治上的權（即財閥政治），一切的權利歸於己，一切的負擔加於人民（即徵兵徵糧及搶劫財物的印刷紙幣）等等慘無天日的狀態存在，和平是沒有希望的。故要實現和平，非同時實施革命不可。革命的目的是使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不革命的和平是無根基的，所以無論和平的呼聲喊得怎樣響，不革命是絕不能成功的。

反一面，只要革命的兩方（因爲兩方都自認是革命者）迷信武力而不用和平的方法來達到目的。和平是絕對沒有希望的。革命的一方（「成功者」）若果以爲槍桿政治配合印刷財政可以致天下太平而安富尊榮穩坐其龍位，則革命的另一方面（未「成功者」）勢非以燒殺清算及鬥爭等手段來奪取其龍位不可；反之後者若果必以燒殺清算及鬥爭等手段來奪取其龍位不龍位，則前者亦勢非以短棒鐵棍飛機大炮配合其紙幣政策以保持其龍位不可。暴力革命者（注意兩方都自認是革命者）的任何一方既然都是要革對方的「命」，則「困獸猶鬥」，爲保全性命而搏鬥，是一切動物的天性，而況人乎？這樣，以暴易暴，如蘇北的「翻身」與「復辟」，翻來復去，血流漂杵，除解決一部份過剩人口問題外，永遠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所以離開和平的革命是無手段的革命，無手段的革命只會使人害怕，難望其成功。

不革命的和平無法實現，其理至顯，不必細述。至於不和平的革命無法成功也許很有人懷疑，茲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第一，很有人說請我所提倡的和平革命，說：既革命決不能和平，既

和平就不能革命，和平與革命是根本矛盾的，故一切和平革命之談都是不通的廢話。我回答說，這批人所指的革命是改朝換帝奪龍位的革命，奪龍位的革命是要人的命，即你死我活的革命。這種革命顯然是不能和平的。中國歷來改朝換帝的革命都是這一種革命。我所指的革命是指社會制度的革命。一種社會制度，不管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至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可這樣下定義：即由某種思想的普遍化而形成一種普遍的行動再轉變爲社會的習慣。例如民主制度是由民主思想的普遍化而形成普遍的民主行動再轉變爲民主的社會習慣。所以社會制度的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延續。這種革命顯非暴力所能達成。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正是社會制度的革命，而非改朝換帝的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是改朝換帝的暴力革命，對於社會制度的改革很少影響。英國第二次戰後的工黨施政是改變社會制度的和平革命，其成績的卓著直使人驚羨。和平與革命並不矛盾，歷史先例不勝枚舉。

其次，退一步說，假定以暴力手段可以達到社會制度革命的目的，如蘇聯的十月革命，在現在的國內外環境中，亦決不能急切成功。因爲：（一）國內反動集團的勢力確還相當的大，如果以暴力迫它作困獸之鬥，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犧牲大而鹿死誰手，尙不可必；如以和平方法爭取民衆同情，則「失道者寡助」，遲早必自瓦解。而（二），革命的武力有限，現代統治者的地位優於秦始皇時代多了。始皇時代，人民不滿便可揭竿而起與統治者搏鬥，現在竹竿鋤頭決不能抵擋機槍大炮以及飛機炸彈。所以除非武器有來源，人民對於統治者無論如何痛恨，極難以武力取勝的。況且（三）反動集團不免有國外老板撐腰，「擒賊不擒王」永不能成功。再次，在革命的另一方面槍桿政治決不能壓倒餓餓的羣衆，印刷財政亦只會造成更多的敵人。

所舉舉數點已足以證明不和平的革命極少成功的希望。所以要和平必須革命，要革命亦必須和平。有革命的和平，和平才有基礎；有和平的革命，革命才有辦法。中國所急切需要的是和平革命！

和平革命可由目前戰鬥的兩方完成嗎？決不可能。他們或革命而不和平，或和平而不革命，或既不革命，又不和平。他們都是人民的敵人。就革命建國的目標說，我們需要國家獨立，政治民主，及經濟平等。



戰鬥的兩方一親蘇，一親美，一反蘇，一反美，甘於為一黨一派的利益出賣民族做人乾兒子，使國家不得獨立。就政治氣質來說戰鬥兩方都是獨裁。以一個民主加一個民主可成爲和平民主。以一個獨裁加一個獨裁，只有戰爭不會民主。在經濟方面一標榜共產，一維護資本，決難望其合作。以這種氣質不同的極權黨派作西班牙的牛鬥，無組織的人民力竭聲嘶呼籲他們和平合作，組成聯合政府，豈非癡狂？

如何能實現和平並且還能革命呢？這需要一條和平革命的陣線。這條陣線不形成，和平與革命決無希望，這條陣線一形成，和平與革命立時可致。這條陣線形成愈早，人民的痛苦愈少，國家的富強愈快。

和平革命是人民的陣線，因爲人民需要和平與革命。

和平革命是與人共存的陣線，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否則就不是和平了。

和平革命是有目的有辦法的陣線，不是無意義的亂動或不動，否則就不是革命了。

和平革命是建設的陣線，不是破壞的集團。它是建國的主力，不是亡國的妖孽。

和平革命只清算政策，不清算責任，統治者二十年來的錯誤政策，必須糾正，但是不要他或他們負刑事責任。錯誤政策千竊萬担，屈指難盡，大之如槍桿政治政策，印刷財政政策，掛羊頭賣狗肉主義政策，豪門資本主義政策，獨裁教育政策（這在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兩系統中已收完全成效，而在大學教育系統中尚有漏洞，碰巧經過這個漏洞滲出當前的學潮來，嗚呼，統制思想亦不易哉！）等等，小之如新疆案件，台灣案件，以及最近各地槍打學生案件等等，天怒人怨，到了似清算而非清算關頭總以「我負責」一個三字訣了之（最近在參政會中有人提出反對壓迫學生問題又以「我負責」的三字訣搗過了）。這些錯誤的政策當局雖逃不了責任，而事實上以爲槍桿在手可以負起一切的責任。可是和平革命者不要他們負責，因爲知道他們負不了責任的。非獨不要他們負責，而且他們應得的功如領導抗戰還是歸給他們的。這不是採取將功抵過政策，例如邱吉爾與戴高樂不能因爲他們抗戰有功就可以讓他們永久繼續行施他們的錯誤政策。這是因爲要和平革命，不能不如此做。對於暴力革命者的燒殺和獨霸政策

們同樣地要糾正，但也不能要他們負燒殺的責任。反之，他們的純正動機及刻苦精神，我們是欽佩的。和平革命陣線既只清算政策，不清算責任，目前的戰鬥兩方決無庸畏懼這一種勢力的抬頭；非獨無庸畏懼，如果兩方真是爲國爲民甚至善爲自身的話，實應歡迎其抬頭以打開目前的僵局。

中國局面的澄清只有兩條路，其目的地則是同一的，即和平革命建國。第一條是和平革命陣線迅速形成，其力量龐大而堅定，足以左右戰鬥的兩方，使之就範而達和平革命建國的目的。第二條是和平革命陣線因受兩方壓迫而不能形成，或只有散沙般的呼喊而不能形成堅強的陣線，則戰鬥的兩方仍必繼續作破壞性的惡戰。惡戰的結果，天怒人怨，反動的一方因它自身的腐爛，所謂日暮途窮，愈來愈反動，愈來愈倒行逆施，前進的自由的愛國的原來中立的分子愈來愈被壓迫，紛紛走入極端的過激方面，然後將反動政權推翻。此時非獨清算政策，還必須清算責任。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袁世凱，希特勒，墨索里尼一大串都是典型的例子。那時過激方面雖在戰鬥上取得領導的地位，但在建設上仍不能不讓中和分子抬頭而達和平革命建國的目的，否則將再演成重複的暴力革命。反動方面必敗是歷史的定律；敗是遲早問題，不是可能性問題。過激獨裁不能和平建設也是歷史的定律，自法蘭西大革命以至蘇俄十月革命都曾屢次證明的。

以上兩條路，第一條是穩妥便捷，犧牲小而成功大，第二條是危險艱緩，犧牲大而成功難期。究竟取那一條路，環境不無影響，但人力實居大半。最近學潮澎湃，要求和平與革命的呼聲，響徹雲霄。這股怒不可遏的洪流，如果不走極端以致中途洩氣而潰散（假如不走極端當不至於潰散）而能形成一致的和平革命的人民陣線，則其力量無比，自必成爲建國的主流。

我們期望着，全國的人民殷切地期望着這一陣線的迅速形成。

兩個戰鬥陣線違反人民的意志，做了人民的敵人。它們是沒落了，迅速地沒落了。人民要建起自己的陣線來，迎接它們的沒落。

人民的陣線是和平革命的陣線，我們需要這個。

（完）

# 演講生意 (轉載)

Upton Close 著  
柳村 譯

我現在說我是「以演講為業者之一」，那就無需再說什麼抱歉的話了。因為演講這一項生意，並不算得寒賤，現在美國擁有顧客三百萬人，每年收入三百到五百萬元，而每一元の影響，在政治和民衆的趣味方面說，實遠甚於出版事業和無線電廣播。在目前美國生活中，演講生意業已基礎鞏固，且有蒸蒸日上普及各地之勢，過去在廢止販買黑奴，禁止造酒，婦女選舉權以及流通圖書館等各運動中，演講皆盛極一時，發揮不少力量，而現在又成爲促進社會生活的一種利器了。

十年前，有人嘗說應用無線電廣播，演講便無立足之地。誰知演講遇到了這種威脅之後，便改絃更張，轉變方向，不像從前那樣獨打己見，而與聽衆取問答的方式，因無線電廣播不能與聽衆一問一答，故必有賴於演講，結果無線電廣播反成爲演講之一大支柱。

職是之故，演講這項生意，雖有各種阻力，而一般人聽演講者，較前更爲踴躍。美國教育行政機關正和各地學校當局合力招集幾千幾萬人民，到各學校裏去聽關於目前民主政治各項問題的演講，並與主講者互相問答。空中會堂將自邁阿密河至阿拉斯加的一千五百個聽講團體聯在一起，而該會堂現已訂十五年計劃，想將聽講團體增至五萬之數。這些團體的份子行將大量增加，而他們都很歡迎全國聞名的演講家去演講。

一度銷沉的「沙達夸」的理事又復活躍起來，在兩萬人以上的大城市，組織四十個著名講堂，每年預算可達一萬五千元。沙達夸運動的老手佛蘭克林，嘗證明一般商人都醉心於過去只限於婦女俱樂部中舉行的各種演講。他的部屬便在五十個小城市裏組織各種俱樂部聯餐會，並設立會堂，敦請專家來演講文化及時事問題，而那種組織，目前又增加了五十個。近來一般政治家，像一九一六年的外國宣傳家一樣，發現了講台的妙用。現在的投票者情願花錢去聽演講者討論問題，而不願去聽政治宣傳。

他相信演講者比政治家誠實。因此一般聰明的政治家，現在都願花錢買通演講業經理人，使從事於競選運動的演講者，表面上講一點關於商業方面的東西。可是那些經理人却不願入其彀中。

演講不僅集中於各城市，且已擴展到鄉野之地。柯林斯紀念節日巡迴隊嘗請演講者到三百個東部村落去，每一村落舉行六日文化「節」，出資一百九十五元。演講者大都是國外歸來的傳教師，前任政府官吏以及大學教授，他們除膳宿之外，可得週薪六十元。

演講的市場，一半集中在各種俱樂部裏。聯邦兩千個婦女俱樂部中，經常舉行商業性的演講，其他各種專業的、宗教的、文學的、歷史的、消費的、改革運動的以及業餘的組織，演講的次數亦有增無已。任何一種行業，開大會時，每於聚餐之前，請名人來講演。此外，成千成萬的音樂會、體育會、宗教會，都少不了要請人演講，每晚致酬自五元至五十元不等。這樣一說，我想讀者對於演講市場的情形，已可了然。誰都知道底特律城是個商業中心而非文化中心，可是本年春季却每日舉行二十次演講。

在普遍的美國演講市場中，最大的三家票房這一季給愛麗諾·羅斯福，英國前任海軍部長休·約翰遜·達夫·古柏，德國的湯麥斯·曼，法國的居禮夫人，以及演講時事的約翰·根室，陶樂絲·湯帕遜等所賣的入場券，將近一百萬元之譜。

凡是演說名家，每次收費帶一千元，甚至更貴，其中由票房抽去百分之五十五，以爲登廣告和交通費之用（食宿不在內）。各地團體向聽衆所收之費，往往除付演講費及其他開銷外，還有一點贏利。H C 威爾斯最近這次來美旅行，演講業經理人哈樂德·庇特給他每晚三千元代價，而他有時從票房裏直接拿到的，甚至達六千元。愛麗諾·羅斯福的經理人給她每晚一千元以上，主要的是爲了大家要「瞻仰」她的豐采，然同時因爲

她熱心公益而且性格高尚，所以大家都愛聽她演講。

在美國方面，使演講成爲一種大生意的，當歸功於詹姆士·龐德。他曾將英美各大名家拉上講台，而予民衆以絕大影響。

總之演講已成美國生活中的主要部份。舉凡，成人教育，函授學校及

## 論戰後外交

景蘇

第二次大戰以後，國際的局勢未能澄清，大概什麼人都做這樣的看法。國際舞台的主角，亦許今昔有所不同，美國取得了從前英國的地位，蘇聯宛如當年的法蘭西，除此之外，相互的勾心鬥角如故，相互的傾軋爭奪如故，甚至發生糾紛的幾個問題，還是舊時遺留下來的，歷史進步之遲緩，真是出人意表。

很多觀察國際局勢的人，總認爲現在已造成了兩種主義的壁壘，大部分離於調排的困難，都是從此而生。這個想法，頗有似是而非之憾。蘇聯的政治主張，其實很少人加以非難，但是外交上的方針，頗有令人不能安心之處。社會主義是今後各個國家的鵠的，美國亦未能例外。縱使各國所採的步伐未必完全相同，惟均將趨向於此同一目標，那是沒有問題的。所以蘇聯以外的國家，一定會造成防共陣線以使蘇聯的主義封鎖於一隅，這不見得有這樣的事情。假使蘇聯不是這樣的熱心於她的掠奪物，假使蘇聯不是這樣積極的造成她的勢力圈，現代的國際問題可以簡單許多罷？

當然，蘇聯的所以採此方針，也有她心理上的背景，一九一八年以後的種種，常常使她懷疑到列強的友誼。她的處境一向是孤立無助的，這次雖然因對抗法西斯主義而得到同盟國的合作，但是公敵一去，她不要回復到以前被封鎖的狀態麼？與其乞靈於聯合國的憲章，還不如乘機擴張實力。因此她不能不注意於東西兩線的向外伸張，從前法國小協約國的政策，萬不許重演於今日。由是她顯得偏狹燥進，求得她的諒解幾乎是不可能的。

事情。  
蘇聯也有一種理論上的偏見，認爲她的主義不容於其他的國家。儘管各種國家的理想事實上天天在那裏接近，而她總自以爲是革命的先進國家

讀書俱樂部等，皆得力於演講。而於今日政治，尤爲重要。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總覺得商業性的演講台是言論自由的最後一着，政府不能設法獨占和統制，因爲凡能講述對於美國生活有重大關係的人，必有團體爲之後盾。

，與英美有不可渡過的鴻溝。從這個邏輯推演下去，蘇聯的擴張政策還是種解放運動。她的建立衛星，不僅爲事實所需要，而且也是理論之所必趨。「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原是劣勢狀態中不得已的政策，優勢狀態中豈復能墨守成規？

在這種場合中，我們想起拿破崙統治之下的法蘭西。拿破崙踐踏了意大利，屈辱了奧大利亞和普魯士，更東向而問鼎莫斯科。他所持的理由，也是爲了法蘭西共和國的安全，也是爲了解放被專制所奴役的人民。當時的英國，本來是在向着光榮革命所指示的途徑前進，她的自由主義，最少是爲法國的革命理論家所崇揚的。可是法國縱橫於歐洲大陸的鐵騎，終於引起了守舊派的勝利，而造成兩種民主勢力的自相衝突。拿破崙的武力主義，究竟爲了個人的野心，還是爲了共和制度的安全，我們不敢武斷，但是當時理論家之讚美此種舉動者，固皆欣欣然以爲這樣可以散播革命的種子。不過無論如何，英國在當時的確不能說是反動的國家。尤其同情於美國獨立的柏克，決不能說是反動的思想家。而且滑鐵盧戰爭以後的英國，亦比法國更能順利的向民主制度前進。這個民主的英國，一樣不能容忍拿破崙的姿態，法國的民主力量，不能不因拿破崙之受挫而遇到打擊。

現在人來看法國革命史，沒有一個不說拿破崙的英雄主義妨礙了民主思想的進步，但一八一五年以前，因同情於法國革命而認爲拿破崙的行動合理者又有多少？其實革命理論是一事，英雄主義又是一事，二者不能併爲一談，實在不能因爲同情革命的緣故而也同情於革命國家的英雄主義。拿破崙縱橫歐洲大陸的行動，即使有爲了共和制度的安全，爲了解放被專制所奴役的人民等堂皇的理論根據，仍不能減輕其他國家的惶恐與不安。

再回過來看近代蘇聯的外交，我們很可惜她也要走上革命法國的覆轍。而同情蘇聯政治主張的人，也在那裏爲蘇聯的外交政策喝彩，一如十九世紀初葉同情法國革命的人一樣。這是歷史的重演，歷史錯誤的重演。

我們要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若不把蘇聯這個民族國家爲中心，許多地方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釋。稍爲知道外交史的人，很奇怪於莫洛托夫實際上是被得或尼古拉的繼承人。以往帝俄所採取的方略，蘇聯很少加以改變，甚至有許多地方更加强了大膽的前進政策。從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始終想予以控制，甚至地中海中還要找幾個階梯石。羅馬尼亞捷克波蘭成爲衛星國家以後，更希望德國成爲控制區域。在遠東又有她不肯讓步的所謂根本利益。這種種，她都說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安全，爲了解放被壓迫的弱小國家。不問這種理由是否出於真誠，以這種理由去說服與她同時存在於地球上的國家總是很困難的。大家祇覺得她的安全影響了人家的安全，由是忘掉對於她政治主張抱同情的態度，甚至忘掉與她數年來並肩作戰的友誼，而紛紛謀抵制之策。所謂杜羅門的授希土計劃，所謂英美對德政策的一致，所謂英國扶助法郎哥政權，所謂美國的幫助日本復興，都可以說是一年來蘇聯外交政策的反響。

大戰之後，蘇聯會利用每個機會，抓住每個機會，大膽而率直地享受戰勝的利益，使其他國家祇能於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承認已成事實。當然，我們並不能說戰後和平的暗礁，均由蘇聯所造成。但蘇聯的外交政策，未曾離開民族國家一貫的作風，却也是無可爭辯的。把國家的生命線放在自己國境之外，當然容易引起猜忌和傾軋。而以國家的生命線放在自己國境之外，除哥必諾 Coblenz 的人種優劣論之外，實際上是找不到什麼理由的。

雷佛斯 Ruffs 會說：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是工業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發生矛盾的時代，這最透闢的說明戰後外交還是這樣糾纏不清的原因。美國所採的是民族國家的立場，英國所採的是民族國家的立場，法國所採的是民族國家的立場，而蘇聯的也同樣是民族國家的立場。所謂民族國家的立場，即是以本國爲中心，一切是非公道的標準，都要以這個觀念去加以解釋。由是合於本國利益者爲是，不合於本國利益者爲非，以至此一非與彼一非完全不同。

現在我們且分析戰後的國際局勢。美國對於蘇聯，逐漸從消極的妥協而達於積極防範的階段，這是什麼人都看得出來的。誠如華萊士所云：到了今天，「任何獨裁祇須高舉共產骷髏，即可向美國乞援」。對於希臘抱這個態度，對於日本何嘗不抱這個態度？這種態度的真意是什麼？無非堅決的要蘇聯停止其向外擴張的運動。不特杜羅門總統要問蘇聯的欲求是否有個止境？就是范登堡也是要這樣問的。甚至工黨的阿脫里，他亦是要這樣問的。「均勢主義」，這是外交上的不祥名詞，但任何民族國家都會堅守這個原則。美國從孤立主義的陣線中退出來，很自然的就要繼英國而執行這個均勢政策。蘇聯擴張的太猛烈。蘇聯就變成均勢政策的對象。美國之所以不惜任何代價，必須以阻止蘇聯的擴張爲第一目標，其故即在於此。美國的所以採取此種堅決立場，與其說爲了防共，無寧說爲了民族國家的安全。

大體上說，英國的態度比較與美國一致的。貝文外相的作風，完全代表了這個態度。英國是戰爭中受損失的國家，而將來的戰爭，英國還是一樣要遭遇損失。大英帝國的光榮，是否能再經得起幾次大戰的試驗，殊屬疑問。所以英國將堅守張伯倫首相所遺傳下來的綏靖政策，殆爲必然的趨勢。可是蘇聯在歐洲東部的活躍姿態，究竟對英國更有直接的威脅，祇要美國有明顯的方針，英國自亦無不樂於追隨。就是法國，雖然一時收斂她左右歐陸的雄心，但爲自己安全打算的決心，始終沒有鬆懈過。對於德國的處理問題，即使與英美有不同的見解，而防止「北方大熊」的內心，實與英美並無二志。

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之中，蘇聯能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巧妙地造成許多已成事實，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大成功。可是這種成功，同時亦引起了猜忌和怨恨。不問她用什麼藉口，不問她具有什麼正當的理由，它的擴張總是引起很大的不安與不滿。說實在的話，就是在並肩作戰的時期，蘇聯尚有所待的態度，已經使大家如坐針氈。而戰後着着爭先的作風，更使同舟共濟的情緒受到打擊。

我們不希望第三次大戰爆發的人，對國際局勢除感覺不安之外，更應該在這種種矛盾之中找一個解開死結的方法。我們不希望杜魯門走上梅特涅的路，我們也不希望史太林走上拿破崙的路。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 民主論壇週刊 第一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一千五百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五六二

上海總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南京總經售處 中外書局

太平路八一號之一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本刊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通匯地點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遂寧 內江 自流井

##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機器廠——供應各種式樣機件  
麵粉廠——供應各種麵粉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87802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Chung yu Shanghai 或 0195 電掛報電

外國分公司：紐約 香港

外國代表：倫敦 印度

## 義豐錢莊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營業項目：一、存款 二、放款 三、匯兌 四、貼現 五、代理收匯 六、押匯 七、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上海分莊：

地址：甯波路二二三號

電話：九三三三號

電話：九一八七號

重慶總莊：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電報掛號：四四一六號

##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一號

電報掛號 七三三七

電話 (〇二) 六二〇五七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